

論 1943 至 1949 年上海文學場域中 報刊對張愛玲及其作品的想像和形塑¹

梁慕靈²

提要：張愛玲自 1943 年正式發表作品以來，在上海、香港和臺灣等文化場域的活動不輟，在她 1995 年逝世後，其影響力至今仍在。回顧她在上海時期身處的文學場域，由於各種特殊的政治和社會因素，淪陷區內的女性作家得到發揮所長的空間，張愛玲亦乘勢冒起。然而，我們必須對張愛玲身處的文學場域有所了解，才能清楚催生這個獨特的歷史空間出現的原因及背景。同時，張愛玲作為知名女作家，在上海的文學場域內是怎樣被想像的？女作家本身又如何成為場域內各種勢力在想像和形塑中國方面的資本？張愛玲本人對這些問題又有何反應？關於這些問題，本文將分開兩個階段來探討。第一個階段由張愛玲在 1943 年 5 月首次發表作品，直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戰勝利為止。第二個階段則由 1945 年 8 月 15 日後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本文將整理並歸納場域中有關張愛玲及其作品的報刊評論，並分析場域內各種勢力對張愛玲作為女

¹ 收件日期：2020/01/20；修改日期：2020/08/25；接受日期：2020/09/20
本論文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授予研究金額資助，編號為 UGC/FDS16/H02/17。在此感謝本計畫研究助理樊凱盈女士和龔倩怡女士之鼎力協助。

²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性作家的想像，特別是這種想像如何依循過往的性別和國家論述模式。

關鍵詞：文學場域、張愛玲、報刊、想像、形塑

Examination of How Newspapers in the Shanghai Literary Fields (1943-1949) Imagined and Shaped Eileen Chang and Her Works³

Leung, Mo-ling⁴

Abstract: Since her first official publication in 1943, Eileen Chang had shown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cultural fields of Shanghai, Hong Kong, and Taiwan. Despite her death in 1995, her impact remains strong to this day. Due to different special political and social factors in the Shanghai literary fields, female writers in the occupied areas we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 which resulted in the emergence of Eileen Chang.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sons and background that gave rise to such a unique historical zone, it is imperative to first examine the literary fields faced by Eileen Chang. In addition, as a prestigious female writer, how Eileen Chang was imagined in the Shanghai literary fields? In what ways was this female writer utilized by various powers in the fields to imagine and shape China? What was the reaction of Eileen Chang to this situation?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³ Received: January 20, 2020; Sent out for revision: August 25, 2020; Accepted: September 20, 2020

⁴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wo phases for discussion. Phase one starts with Eileen Chang's first publication of her work in May 1943 and ends with China's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on 15th August 1945. Phase two covers the period after 15th August 1945 until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is article will organize and categorize all newspaper commentaries in the fields concerning Eileen Chang and her works. It will then analyze the imagination of various powers in the fields towards Eileen Chang as a female writer. Emphasis will be put on examining the conformity of their imagination to the established gender and national narrative conventions.

Keywords: Literary fields, Eileen Chang, newspapers, imagination, shaping

一、引言

過去我們在研讀張愛玲（1920-1995 年）的作品時，很多時候都是從她的小說集或散文中直接閱讀，因此對於她為何要寫該篇文章，或是她寫作的內容指向哪些讀者等問題都不太清楚。例如〈必也正名乎〉這一篇文章，為什麼張愛玲要談及自己的名字？又例如關於〈「卷首玉照」及其他〉一文，為什麼張愛玲要討論自己的照片？這種「割裂」的閱讀情況令我們了解到，如要全面理解張愛玲的作品，就必須了解她的創作與文學場域的關係。

張愛玲自 1943 年正式發表作品以來，在上海、香港和台灣等文學場域的活動不輟，甚至在她 1995 年逝世後，其影響力至今仍在。回顧她在上海時期身處的文學場域，由於各種特殊的政治和社會因素，淪陷時期內的女性作家得到發揮所長的空間，張愛玲亦乘勢冒起。然而，張愛玲在抗戰勝利前後所面對的輿論和勢力關係網都截然不同，這些因素大大影響到她的創作風格和出版狀況。我們必須對張愛玲身處的文學場域有所了解，才能清楚催生這個獨特的歷史空間出現的原因及背景。同時，張愛玲作為知名女作家，在上海的文學場域內是怎樣被想像的？女作家本身又如何成為場域內各種勢力在想像和形塑中國方面的資本？張愛玲本人對這些問題又有何反應？

關於這些問題，本文將以兩個階段來作研究範圍。第一個階段由張愛玲在 1943 年 5 月首次發表作品，直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戰勝利為止。第二個階段由 1945 年 8 月 15 日後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本文將整理並歸納場域中有關張愛玲及其作品的報刊評論，並分析場域內各種勢力對張愛玲作為女性作家的想

像，特別是這種想像如何依循過往的性別和國家論述模式。要探討上述問題，本文亦會參考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有關文學場域的理論、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的「社會想像」的理論以及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關於公共領域的理論，去分析龐雜而多種多樣的張愛玲報刊資料，冀望能結合幾位學者對場域、社會想像和公共領域的看法，客觀地分析張愛玲由 1943 年至 1949 年於上海場域的各種活動，與其人和其作品如何被想像和被形塑的關係。

早於 1980 年代，已有學者從淪陷區文學史的角度討論過張愛玲與區內文人交往和出版的情況，例如劉心皇在《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就曾簡單提及張愛玲被認為是漢奸的情況，甚至下了一個判斷：「我想，她在『春秋大義』、『民族大義』之前，是應該懺悔的。」⁵ 古蒼梧在 2002 年亦曾以 1942-1945 的上海作為切入點，討論上海淪陷時期幾本文學雜誌跟區內文人，特別是胡蘭成、張愛玲和蘇青的關係，更為系統地處理了相關的研究，唯未有把抗戰勝利前後作出比較研究。⁶ 近年，亦有研究者討論過抗戰前後上海文學場域中的文人互動，這些互動不少都與張愛玲有關。楊佳嫻曾以胡蘭成為研究重點，討論他在戰時上海到戰後臺灣的影響力，所舉例子包括幾本控訴漢奸的小冊子上，例如《文化漢奸罪惡史》、《漢奸醜史》、《漢奸內幕第一輯》和《漢奸內幕第二輯》等。⁷ 在上述

5 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 年），頁 131。

6 古蒼梧：《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張愛玲、蘇青、胡蘭成的上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楊佳嫻：《懸崖上的花園：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 年），頁 369-428。

的研究基礎之上，本文將通過研究和梳理大量 1943-1949 年的上海報章資料，更為具體探討普羅民眾如何受到日常都能接觸得到的報刊所影響，以及如何在連續不斷的報導下被主導想像的方向。這比起過去的研究常談及的那些控訴漢奸的書籍，影響範圍可能更為廣泛和深入。

從場域的角度入手，可以衍生出性別和國族相互依存的視角，去觀察作家在面對歷史、倫理和道德，特別是本文將提及的女作家生存狀況，包括在經濟上自立和國族上被想像等情況，具體整理出作為個人的女作家如何面對群體所賦予的國族想像，突顯以張愛玲為代表的女作家在 1945 年至 1949 年上海文學場域生存的複雜性。有關這個問題，羅久蓉曾經借助幾個「女漢奸」的例子，探討國族與性別論述中有關忠誠和背叛的問題。⁸ 本文在以下討論張愛玲在抗戰勝利後的類似遭遇之前，將先探討張愛玲在抗戰勝利前在文學場域中的位置和狀況，在了解她與場域中人的交往情況後，以此作為基礎並對比後來場域中的形勢變化。

二、場域中的關係網：

作為「女作家」的張愛玲及其文化活動

柯靈在談論當年上海文壇突然出現了女作家張愛玲時，曾有以下這段著名論述：

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同時轉眼紅遍上海。
這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環境特殊，清濁難分，很

⁸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頁 xv。

犯不著在萬牲園跳交際舞……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她一個機會……張愛玲的文學生涯、輝煌鼎盛的時期只有兩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幸與不幸，難說得很。⁹

這段說話歷來被多番引用來討論張愛玲與文學場域的問題，亦即只有當時的上海文學場域狀態才能催生張愛玲這樣的作家，並提供其發表作品的可能性。如果要更為深入分析這個場域以內的各種情況，我們可借用社會學的觀點來入手去分析這個場域是如何運作，去把女作家作為想像資源，並形成一種看似真實的公共領域，亦即場域是如何把公眾的討論投射成一個討論空間。¹⁰ 要討論這個問題，就必須了解場域內的文化人是如何交往，不論是實際的日常交流，或是文字間的論爭或筆戰等，因為這些都在共同塑造一個看似開放的公共領域。公共領域是社會想像的一種突變模式，亦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現象。如果我們不考慮這一種因素，就會出現如同本文首段提出的情況：單單閱讀張愛玲《流言》這本散文集，而沒有考慮場域的勢力或公共領域的影響，結果讀者不會明白她為何要寫這些文章；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文章重置到場域中的出版脈絡，就可以發現這是張愛玲對場域內的社會想像的一種回應。因此，本文以下將以場域的角度來探討張愛玲與各種勢力之關係，並梳理場域內政治背景、派系與她的文化活動的關係，以及她如何面對各種場域鬥爭並爭取文化資本。

⁹ 柯靈：〈遙寄張愛玲〉，《私語張愛玲》（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頁 15-25。

¹⁰ 查爾斯·泰勒著，李尚遠譯：《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頁 145。

要回應上一節提出的問題，本節首先以布赫迪厄的場域理論作切入點，從宏觀的角度審視整個場域的情況，以便後文更為清楚地處理有關張愛玲的報刊資料。布赫迪厄認為，一個場域的概念其實就是關係的概念，場域就是指一定範圍之內，在各種權力和位置之間，所存在的客觀關係的網絡（network），或是一種構型（configuration）。佔據這些位置，就等於擁有這些位置的權力或資本，這意味著擁有這些權力就可以把持和控制這一場域中獨有或專屬的專門利潤（specific profit），並影響位置與位置之間的從屬關係、支配關係等等。¹¹ 布赫迪厄又提出，場域的邊界在於其影響停止運作之處。¹² 因此，文學場域如同其他場域一樣，都會通過抗爭來逐漸以「淨化」的方法，提煉出該藝術或體裁自身的基本原則，例如俄國形式主義所說的「文學性」。布赫迪厄稱這個場域的建立過程就像「提取物質精華的煉金術士」的角色，於是場域的歷史分析就是自身的精華分析的唯一合法形式。¹³ 當文學場域向自身要求更多的自主時，例如與政治場域、知識場域等進行角力，「文學性」本身就成為文學場域界定自身邊界的原則。但是，在市場取向、學術圈子和政治立場等多方面的影響下，所謂的「文學性」就會在角力之間搖擺不定。過去我們習慣以通俗文學與新文學等角度來理解這種角力，但是通過本文的研究框架，我們可以看到，「張愛玲」本身及其作品，就是在這種場域中各種勢力爭奪資源並互相角力下，在

¹¹ 布赫迪厄、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年），頁157-158。

¹² 布赫迪厄、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頁162。

¹³ 布赫迪厄著，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頁169。

性別、國族、文學自主性、政治、市場導向等多方面被拉攏、排斥、想來和定型。簡單來說，張愛玲由較早時在場域中被稱為「奇蹟」、被胡蘭成以「貴族」來塑造形象；到抗戰勝利後，報章竭力在上述各個角度把「張愛玲」本身及其作品「還原」，甚至把她降格到「女漢奸」或「文妓」的情況，都可以用場域的角力理論來看待和研究。

對於上文提到場域中的專門利潤，張愛玲是深懂其中的道理的。例如在抗戰勝利前，曾發生「一千元灰鈿」事件，張愛玲與秋翁（平襟亞）曾為稿費事件而爭執。在秋翁於 1944 年 9 月 12 日發表的〈最後的義務宣傳〉中，曾提及張愛玲給他的一封信，內容如下：

我書出版後的宣傳，我曾計劃過，總在不費錢而收到相當的效果。如果有益於我的書的銷路的話，我可以把曾孟樸的「孽海花」裏有我的祖父與祖母的歷史，告訴讀者們，讓讀者和一般寫小報的人去代我義務宣傳——我的家庭是帶點「XX」氣氛的，……¹⁴

這就可見張愛玲在早期寫作中已有這種利用話題來刺激作品銷路的想法。如果我們翻查當時文學場域內的報章或雜誌資料，可以看到張愛玲與文化界和讀者也有很多溝通往來。例如她在 1944 年給《力報》編者的一封書簡，就表達了她對小報的態度。¹⁵張愛玲與錢公俠主編的語林社關係也不俗，我們可以在 1945 年 6 月 6 日的《申報》找到關於《語林》的廣告，當中刊登了張愛玲的讚賞《語林》的一段話：

¹⁴ 秋翁：〈最後的義務宣傳〉，《海報》，（1944 年 9 月 12 日），頁 3。

¹⁵ 張愛玲：〈女作家書簡〉第一則，《春秋》，第 2 卷第 2 期（1944 年 12 月 28 日），頁 74-79。

好評所歸！

……

張愛玲女士：「語林是獨創一格的雜誌，非常難得的。……」

又說：「語林真是精彩得很。……」

語林六月號（第五期）業已出版，每冊仍售五百元。¹⁶

這段廣告除了引述張愛玲的話，也有朱鳳蕭、文載道、王淵的捧場話。相隔十多天，《申報》又有一段類似的廣告：

口碑載道！

……

張愛玲女士：「……語林獨創一格……非常難得……真是精彩得很。」¹⁷

這些資料可以讓我們見到，張愛玲在上海時期的文學場域中與文化界的來往並不少，並且很懂得商業促銷和文人互捧的方法。這種情況亦牽涉到張愛玲與傅雷、胡蘭成及其他文化人的對話和互動，下文將會舉出更多例子。

張愛玲非常了解場域中其他文化人對她本人和其作品的態度，是一種場域內的資本，同時也是一種牽制。她對自己身處的文學場域非常敏感。這種情況在多年後張愛玲與宋淇的通信中，我們仍然可以多次看到二人對這些場域資本的討論和思考。例如在 1979 年，張愛玲與宋淇討論到香港作家亦舒與台灣作家水晶對她的「新作」的批評，明確提到兩人「是我的一點老本，也是個包袱，只好撐著，不過這次帶累 Stephen。」¹⁸ 早於她在 1944 年寫作〈童言無忌〉的

¹⁶ 〈好評所歸！〉，《申報》（1945 年 6 月 6 日），第一張。

¹⁷ 〈口碑載道！〉，《申報》（1945 年 6 月 21 日），第一張。

¹⁸ 張愛玲、宋淇、宋鄭文美：《張愛玲私語錄》（香港：皇冠出版社，2010 年），

時候，她已提及自己對大眾讀者與作家之間的關係的看法：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著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買雜誌的大眾。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僱主，不那麼反覆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願要一個抽象的。¹⁹

這段文字明確表示張愛玲在寫作時處處考慮自己與場域中的讀者的關係。同樣在寫於 1944 年的〈論寫作〉中，她強調自己是一個職業文人，故此要考慮讀者的心理與反應。她認為：

文章是寫給大家看的，單靠一兩個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爭取眾多的讀者，就得注意到群眾興趣範圍的限制。²⁰

怎樣才能知道讀者要什麼呢？張愛玲認為要「將自己歸入讀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什麼。要什麼，就給他們什麼，此外再多給他們一點別的。」她舉《紅樓夢》為例，提出《紅樓夢》對讀者來說是「要一奉十」的。這裡「要一奉十」的說法非常重要，它代表著張愛玲對身為場域中的作家與讀者關係的清晰理解。

梳理清楚張愛玲對場域的看法以後，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張愛玲其人其文與場域內的互動關係，從以下例子我們可以一瞥當時的

頁 230-231。

¹⁹ 張愛玲：〈童言無忌〉，《流言》（香港：皇冠出版社，1998 年），頁 9。

²⁰ 張愛玲：〈論寫作〉，《張看》（香港：皇冠出版社，2000 年），頁 235-236。

情況。首先我們可以從作品的角度出發。第一個例子出自張愛玲〈自己的文章〉中「時代的紀念碑」這個說法。「時代的紀念碑」過去由唐文標定論為張愛玲回應傅雷之說法，而根據邵迎建的研究，其實應為張愛玲回應胡蘭成〈皂隸·清客與來者〉的說法而來。²¹第二個例子是〈寫什麼〉這篇收入《流言》的散文，一直以來我們都以為是張愛玲的一篇獨立散文，但如果我們回歸「歷史現場」，找尋當日於《雜誌》內刊登的文章來看，就可以見到這是張愛玲與其他作家為一個名叫「我們該寫什麼？」、由「諸家執筆」的總題而寫的文章，文中有一段「特輯前言」說明設立這個題目的原因：

這一期是本刊復刊第三年的開始，我們約了十一位經常執筆的小說作家回答一個：「我們該寫什麼？」的問題，彙為特輯，呈獻在讀者之前。本刊復刊以來，內容雖為綜合的，但在份量上文藝部分所佔甚重，小說的份量尤然。據記者所知，近來作家之間頗有論到創作題材選擇問題，讀者也多來信對於創作取材說明其意見，因此，記者想到趁這機會發刊這樣一個特輯，讓我們的作家自己來陳述他們的意見，給本刊復刊第三年的開始作一紀念，也許是頗合時宜的。特輯編次以文稿收到前後為序。——記者²²

這個特輯由十一位作者共同撰寫，依次包括譚惟翰、疎影、張愛玲、谷正櫬、朱慕松、錢公俠、王予、林鳥、張金壽、譚正璧和石木。要結合這個專題來看，才可以解釋為何張愛玲在〈寫什麼〉

²¹ 邵迎建：〈張愛玲和「新東方」〉，《回望張愛玲·昨夜月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頁158-159。

²² 〈我們該寫什麼？·特輯前言〉，《雜誌》，第13卷第5期（1944年8月10日），頁9-18。

一文內會說「文人討論今後的寫作路徑，在我看來是不能想像的自由——彷彿有充分的選擇的餘地似的。」這句說話，明顯就是回應編者提出這個寫作專題，同時亦可見到這篇文章本來並沒有〈寫什麼〉這個標題。從以上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張愛玲的不少文章都與當時場域內的人文交流或互動有關，而不是割裂的創作。

從 1943 年至 1949 年的上海報刊中，我們可以發現不少張愛玲在上海文學場域參與文化活動的消息。例如她曾於 1943 年 11 月 14 日到電臺朗誦小說：

上海廣播電台，為協力新中國文學運動，提高聽眾文藝欣賞興趣，特定於今日（星期日）下午九時三十分，在該電台舉行文藝朗誦，並經本市中日文化協會滬會企劃處長柳雨生氏之斡旋，特別商請名小說家譚惟翰及女作家張愛玲女士，朗誦創作小說，愛嗜文藝及喜愛兩君作品者，屆時當可於電波中收聽。²³

在 1943 年 11 月左右，張愛玲在中文寫作方面發表了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和〈洋人看京戲及其它〉，小說方面則有〈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傾城之戀〉、〈金鎖記〉、〈封鎖〉和〈琉璃瓦〉已經發表，正值她的創作高峰期。這亦是她較為熱衷參與文化活動的時期。

除此之外，張愛玲於 1944 年 2 月 7 日參加了中日文化協會滬分會舉辦的女作家座談會，當時的情況在〈中日文協舉行女作家座談會——晚間設宴招待小林秀雄氏〉一文記錄如下：

中日文化協會滬分會，昨日下午三時在亞爾培路該會舉行茶會，招待上海婦女作家。計到天地社主編馮和儀（蘇青），

²³ 《申報》（1943 年 11 月 14 日），第一張。

文友社編輯潘柳黛，婦人大陸社編輯春野鶴，太平洋週報編輯室伏古樂，日本文藝主潮社同人三村亞紀，及女作家張愛玲，潘瓊英，陳綠妮，陳海魂等，又著名畫家村尾絢子，前曾赴漢口前綫考察，亦參加該會。由事務局長周化人氏主席，就中日婦女生活，文學創作，婦女總動員諸問題，有所討論，情緒熱烈，至五時餘散會，同晚六時該會在錦江餐館設宴招待日本著名文學批評家小林秀雄氏，□小林秀雄，陶晶孫，丘石木，柳雨生，□風，潘予且，石川佐雄，草野心平，馮和儀，關露，佐藤貞子，文載道，等多人，□由主席周化人介紹小林氏對日本文壇之功績，繼由小林秀雄致答辭，並即席討論中國文學界之動向。²⁴

由這段文字可見，張愛玲在 1944 年出席的文化活動，除了與場域中的中國作家來往外，亦有與日本文化界聯絡。其他的大量文化活動例子包括同年的 3 月 16 日參加了上海雜誌社舉辦之女作家聚談會、²⁵ 於夏天參加滬江大學英文系章珍英舉辦的文藝聚會、²⁶ 8 月 26 日參加《雜誌》舉辦的「《傳奇》集評茶會」、²⁷ 11 月 12 日至 14 日原獲邀出席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張愛玲回信推辭，未有出席、12 月左右曾通過柯靈介紹，與大眾劇團主持人周劍雲見

²⁴ 〈中日文協舉行女作家座談會——晚間設宴招待小林秀雄氏〉，《申報》（1944 年 2 月 8 日），第一張。

²⁵ 〈女作家聚談會〉，《雜誌》，第 13 卷第 1 期，頁 54-62。

²⁶ 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50。

²⁷ 吳江楓：〈「傳奇」集評茶會記〉，《雜誌》，第 13 卷第 6 期（1944 年 9 月），頁 155-160。

面、²⁸又曾在 1944 年與胡蘭成去邵洵美家吃飯，同席還有施蛰存。²⁹值得一提的是，經筆者翻查資料，張愛玲於 1944 年 10 月 7 日可能有出席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籌備會，因為翌日《申報》上就刊登了〈文學者大會滬代表決定〉這篇文章，記錄了出席者包括張愛玲：

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籌備會，七日舉行五次會議，由龔持平主席，上海出席代表為周越然，張資平，陶晶蓀，傅彥長，包天笑，張若谷，文載道，吳江楓，路易士，張愛玲，馮和儀，關露等十人。³⁰

這篇報導或可說明張愛玲出席了是次籌備會，後來才推辭再出席於 11 月舉辦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到了 1945 年上半年，張愛玲仍然頻繁參與類似的文化活動，例如 2 月 27 日與蘇青和《雜誌》記者在家中進行對話、³¹4 月 9 日出席女作家與朝鮮舞蹈家崔承喜聚談，並去觀看了崔承喜之舞蹈，³²後來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還記敘了張愛玲對崔承喜的評語、7 月 21 日出席由新中國報社舉行的茶會，當日還有李香蘭出席。³³這就是張愛玲在抗戰勝利前主要的文化活動和交際情況。

抗戰勝利後，張愛玲於 1946 年備受各方攻擊，因此她公開參

²⁸ 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頁 56。

²⁹ 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頁 58。

³⁰ 〈文學者大會滬代表決定〉，《申報》（1944 年 10 月 8 日），第一張。

³¹ 〈蘇青張愛玲對談記——關於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雜誌》，1945 年第 14 卷第 6 期，頁 83-89。

³² 洛川：〈崔承喜二次來滬記〉，《雜誌》，第 15 卷第 2 期（1945 年 5 月 10 日），頁 84-88。

³³ 〈納涼會記〉，《雜誌》，第 15 卷第 5 期（1945 年 8 月），頁 70-75。

與文化活動的次數驟然下降，只有在 7 月參加桑弧的私人請客，當日出席的有龔之方、柯靈、炎櫻、魏紹昌、唐大郎等人。³⁴ 直至到 1947 年，張愛玲於 5 月 4 日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上海文藝作家協會成立大會，獲委任為聯絡委員會委員。³⁵ 同年的 12 月，張愛玲只參加了一個私人聚會，接受了董樂山和李維君的拜訪。³⁶ 然後到 1950 年，張愛玲於 7 月 24 日至 29 日，參加了第一屆上海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並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參加土改兩個月。³⁷ 直至張愛玲於 1952 年離滬赴港，暫無發現有張愛玲在這段期間參與公開文化活動的記錄。

抗戰勝利後的文學場域對張愛玲的關注度持續不減，甚至曾掀起張愛玲是否於電臺做播音員、唱申曲的討論。眾所周知，張愛玲的姑姑曾做過電臺播音，在 1946 年張愛玲難以在文壇立足之時，她是否也曾為上海的電臺擔任播音工作呢？在 1946 年 4 月 9 日的一篇〈張愛玲鬧雙包案〉中，記錄了有記者親自去查證唱申曲的「張愛玲」是誰，文中用戲謔的口吻道：

「十八世紀摩登狗兒」新文藝「巨子」「胡門張氏」張愛玲，據說因在「大東亞戰爭」時期為「文壇」宣勞過度心力憔悴故好久的沒有看到她的「傑作」發表了。最近有人看到她在為國家代盡地主之誼，不惜降低堂堂「貴族血液」身份做吉普女郎招待外賓……明天意外地自一電台業同行口中又聽到張愛玲的「豔息」，據他說張愛玲現在竟已與筱月珍許雅

34 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頁 68。

35 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頁 71。

36 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頁 73。

37 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頁 76。

琴做同行，拋開筆桿唱起申曲來了……³⁸

這位作者為了證實唱申曲的「張愛玲」是誰，親自走到金城電臺的播音處查證，發現這位「張愛玲」原來另有其人。如果翻查 1946 年 5 月 20 日的《申報》，當日刊有一則「播音節目」表，當中寫著萬龍生與張愛玲為「滬劇」播音，電臺為「軍政」電臺，播音的週波為一〇六〇，時間為下午四時四十分至五時廿分。³⁹ 在 1946 年 6 月 10 日的〈張愛玲唱申曲〉一文所記，作者柳絮就記錄了這位唱申曲的「張愛玲」已經唱了好幾年的申曲，用「張愛玲」這個名字也是最近的事，可見當時作家張愛玲紅遍上海的情況，連名字也被盜用了。⁴⁰

張愛玲在場域中亦有與文人往來，當中與蘇青的來往頗多，文壇中也常常把二人相提並論。綜觀抗戰勝利前後，場域中的輿論對張愛玲和蘇青的評價均有明顯變化，態度也南轅北轍。在抗戰勝利前，報刊曾刊載多篇論及蘇青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張愛玲的〈我看蘇青〉，這些文章包括：

1. 1944 年 9 月：胡蘭成〈談談蘇青〉⁴¹

³⁸ 阿拉：〈張愛玲鬧雙包案〉，《星光》，1946 年第 4 期（1946 年 4 月 9 日），頁 8。

³⁹ 《申報》（1946 年 5 月 20 日），第一張。

⁴⁰ 柳絮：〈張愛玲唱申曲〉，《風光》，第 14 期（1946 年 6 月 10 日），頁 11。根據尚進《舊聞新知張愛玲》一書所記，於 1945 年 1 月 4 日有一篇由曼厂所寫、刊登於《大上海報》上的一篇文章〈三個張愛玲〉中記載，當日上海確有一位與張愛玲同名的播音員，主要是以唱申曲為節目內容。唯筆者於「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未能找到這篇文章，暫且存疑。見尚進編著：《舊聞新知張愛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61-62。

⁴¹ 胡蘭成：〈談談蘇青〉，《小天地》，第 1 期（1944 年 9 月），頁 16-

2. 1944 年 11 月：譚正壁〈論蘇青及張愛玲〉⁴²
3. 1944 年 12 月 11 日：紅藻〈也談蘇青〉⁴³
4. 1945 年 3 月 28 日：「湖山外篇」專欄〈蘇青與張愛玲〉⁴⁴
5. 1945 年 4 月：張愛玲〈我看蘇青〉⁴⁵
6. 1945 年 4 月 20 日：〈張愛玲怎樣看蘇青？〉⁴⁶
7. 1945 年 5 月 12 日：李七〈蘇青還看張愛玲〉⁴⁷
8. 1945 年 5 月 30 日：鍾士〈我看蘇青〉⁴⁸
9. 1945 年 6 月 23 日：天遊〈海上新詠（七）：愛玲蘇青〉⁴⁹

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抗戰勝利前談及蘇青和張愛玲的文章，多從其作品風格和文字作評論，就算如鍾士〈我看蘇青〉一文沒有談及文學，也只是談及在公共汽車上看見蘇青，品評她的外表等。但在抗戰勝利後，有關蘇青和張愛玲的討論多趨向負面和嘲諷，這些文章包括：

1. 1946 年 4 月 15 日：一之〈張愛玲改名連雲 蘇青忘不了「天

19。

- 42 譚正壁：〈論蘇青及張愛玲〉，《風雨談》，第 16 期（1944 年 11 月），頁 63-67。
- 43 紅藻：〈也談蘇青〉，《東方日報》（1944 年 12 月 11 日），頁 2。
- 44 「湖山外篇」專欄：〈蘇青與張愛玲〉，《繁華報》（1945 年 3 月 28 日），頁 2。
- 45 張愛玲：〈我看蘇青〉，《天地》，第 19 期（1945 年 4 月），頁 5-13。
- 46 〈張愛玲怎樣看蘇青？〉，《光化日報》（1945 年 4 月 20 日），頁 2。
- 47 李七：〈蘇青還看張愛玲〉，《力報》（1945 年 5 月 12 日），頁 3。
- 48 鍾士：〈我看蘇青〉，《繁華報》（1945 年 5 月 30 日），頁 2。
- 49 天遊：〈海上新詠（七）：愛玲蘇青〉，《東方日報》（1945 年 6 月 23 日），頁 3。

地」〉⁵⁰

2. 1946 年 6 月 26 日：木然〈張愛玲諷刺蘇青〉⁵¹

3. 1947 年 12 月 21 日：梅子〈蘇青和張愛玲〉⁵²：

吳性裁創辦文華，非但養活了大批劇影人，連女作家張愛玲也多了一條「財路」，第一炮劉瓊陳燕燕的不了情一片，即是張的編劇，為朱石麟所賞識，法眼不虛，大獲盈利，今番的「太太萬歲」，劇本又是她的手筆，海上過去的女作家，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說部，和蘇青的結婚十年一書，稱做女作家當中兩隻鼎，而張的本事比蘇青本領棋高一著，厥為寫作以外，更能編劇一番，不論為賣劇本，或抽上演稅，總之噱頭大於蘇青，蘇以甯波老戍（讀農）已往雖紅，近月有人亦想接洽把蘇的結婚十年搬上銀幕，為著過去蘇有污點在身，使她大哭，張愛玲蘇青，交運與倒霉，亦註定也。

從這篇文章可以見到，在 1946 至 1947 短短一年間，當輿論再把張愛玲和蘇青並提時，已經是採用一種嘲諷的口吻，並以「污點」和「倒霉」來形容場域中的兩位女作家，與淪陷時期的態度非常不同。

不能忽視的還有場域內讀者對張愛玲的評價和互動。在抗戰勝利前夕，《現代周報》設有一個專欄「讀者之聲」，刊有不同讀者對張愛玲的看法，當中明顯感到一種煽動批評張愛玲和蘇青的趨勢，例如在 1945 年 3 月 31 日的〈讀者之聲〉中，文章的作者自稱

⁵⁰ 一之：〈張愛玲改名連雲 蘇青忘不了「天地」〉，《香海畫報》，第 5 期（1946 年 4 月 15 日），頁 54。

⁵¹ 木然：〈張愛玲諷刺蘇青〉，《香雪海畫報》，第 1 期（1946 年 6 月 26 日），頁 11。

⁵² 梅子：〈蘇青和張愛玲〉，《戲報》（1947 年 12 月 21 日），頁 3。

是一位「女學生」，她向編輯批評張愛玲和蘇青，認為當時的女學生喜愛閱讀二人的文字，「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文章寫得好」，而是因她們文筆大膽，把女學生「所想知道的『性』的知識」告訴她們。文中甚至曲解二人的作品，這個女學生說：

我老實的告訴你，我們女孩子的所以喜歡看他們的著作，是把他們來代表「性」的著作的；從他們的著作中，我們學會了不少門檻，也從他們的著作中，我們知道女子是應該以出嫁為職業的。我們更知道，我們不能在高中畢業之後再進大學，因為大學畢業的女生是沒有人要的。

先生，我們在這時代是夠苦悶的，這種苦悶不能發洩的時候，就自然而然的轉到「性」方面去了，可是人都是怕羞恥的，誰能像張愛玲，蘇青那般公開的說呢？……張愛玲和蘇青他們也許沒有想到，在中國的女孩子之中，他們心目中還有國家和民族存在的吧！⁵³

今天我們無法證實這個「女學生」是真是假，但文中扭曲張愛玲作品的含意和誇大其負面影響力卻是顯而易見的。文中更刻意把張愛玲與蘇青塑造成與「國家」和「民族」對立，彷彿她們的作品中談及性，就會削弱女學生的愛國心。又例如在 1945 年 4 月 14 日的一篇〈讀者之聲·說張愛玲〉中，就有四位讀者展露他們對張愛玲的負面評價。第一位持明揚暗抑的態度：「我歡喜看張愛玲的作品，但是我不知道她為什麼這樣的成名，是否是技巧上的特出，抑是思想上的有功於我們女性。」⁵⁴ 第二位則向張愛玲提問，例如

⁵³ 〈讀者之聲——關於張愛玲等〉，《現代周報》，第 3 卷第 8 期（1945 年 3 月 31 日），頁 36。

⁵⁴ 〈讀者之聲——說張愛玲·一〉，《現代周報》，第 3 卷第 10 期（1945

「現在大家捧著張愛玲，這是否一個好的現象，對於她本身有什麼益處沒有？」⁵⁵ 第三位向編輯提問：「看她所有的作品，似乎她根本沒有去體驗過生活，多認識事物而寫成的。沒有靈魂的草草完成，這有什麼價值呢？她的文章全是有著浮華的態度，用色情的作品來勾引讀者的心……」⁵⁶ 第四位則明顯持批評態度：「我覺得女作家是沒有存在的她的地位，因為她們太看輕藝術，太看輕自己，根本談不上什麼作家的身份，我們單看張愛玲和蘇青吧？她們反使讀者們中了毒，對於社會疏忽起來……」⁵⁷ 這種論述伴隨著場域中越來越多的輿論攻擊，表現了當時集體想像的需求，我們在下一節會更深入分析這種集體心理與政治、性別的關係。

三、想像女性：場域對「女作家」的形塑與定型

在上一節我們已初步從場域的角度理解到張愛玲與 1943 年到 1949 年上海文學場域有著怎樣的互動關係。在本節，我們則會探討這個場域如何對作為「女作家」的張愛玲進行想像，而這種想像又滿足了場域中哪些方面的需要。

首先，本文會借用德國學者哈貝馬斯關於公共領域的理論，去討論場域中的公共空間。隨著現代社會的出現，關於民族和國家

年 4 月 14 日)，頁 35。

⁵⁵ 〈讀者之聲——說張愛玲·一〉，《現代周報》，第 3 卷第 10 期（1945 年 4 月 14 日），頁 35。

⁵⁶ 〈讀者之聲——說張愛玲·一〉，《現代周報》，第 3 卷第 10 期（1945 年 4 月 14 日），頁 35。

⁵⁷ 〈讀者之聲——說張愛玲·一〉，《現代周報》，第 3 卷第 10 期（1945 年 4 月 14 日），頁 35。

的觀念亦相繼興起，在前現代中以家庭為主要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的觀念開始衰落，使到家庭本身逐漸沒落。⁵⁸ 對於這種情況，哈貝馬斯認為，原本在國家和社會的競爭發展中公共領域得到明顯的政治功能之前，家庭的主體性仍然保留有自身的地位和空間。但是隨著現代性進程的發展，社會領域與親密領域出現兩極的分化，使私人生活滲入了公共性，而公共領域則染上了私人性的內向色彩。⁵⁹ 這種情況在現代中國的國家和民族建構中亦明顯出現，國家論述對「私人空間」的侵佔由 1920 年代開始愈趨猛烈。⁶⁰ 對照隨後中國 1930、1940 年代的歷史狀態，我們可以發現當民族國家話語的發展因時局而變得衰弱時，私領域的題材如家庭、情愛等就會重新成為文學場域中重點關注的議題，家庭重新得到其文學語境。在上一節提及的第一個階段中，上海已經進入淪陷時期約兩年，這時女性題材由於戰爭帶來的創作空間而得到很大的發展。新文學的感時憂國傳統由於在日本人的勢力範圍下被迫噤聲，乘勢而出的「舊」派文人如周瘦鵑及陳蝶衣等為了重新吸納年青的讀者，於是採納了很

⁵⁸ Seyla Benhabib, "Models of Public Space: Hannah Arendt, the Liberal Tradition, and Jürgen Habermas,"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raig Calhou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4), pp.73-98.

⁵⁹ 參考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著，曹衛東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第二章及第五章（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頁 32-67 和 170-217。亦可參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9), pp. 27-56 and 141-180.

⁶⁰ 陳建華：〈豈止「消閑」：周瘦鵑與 1920 年代上海文學公共空間〉，姜進主編：《都市文化中的現代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24-245。

多年青的女作家為他們的雜誌的供稿人。女性作家在這個時候成為「舊」海派文壇的主要寫作人，一改以前由男性作家主導的風氣。張愛玲、蘇青、潘柳黛、施濟美等新的年青女作家相繼出現，她們對於家庭、生活瑣碎事物的關注，以及對婚姻及男女關係的看法，都跟 1920、1930 年代的閩秀派作家如冰心、凌叔華、林徽因等不同。這段上海淪陷的真空時期造就新的女作家突圍而出。黃心村認為，這個時期的女作家，通過表面上關於家庭、婦女生活的書寫來記錄她們關於戰爭的經驗，以這種女性的題材來改寫本來屬於男性的國家論述。⁶¹ 亦由於新一代的女性作家湧現，加上大量的女性家庭雜誌相繼出版，關於家庭的議題為這個時期的寫作熱門材料。⁶² 這種由於政治環境轉變而來的寫作空間，不僅為本來在國族性社會想像以外的女性提供發聲的機會，甚至使她們能夠以一種「女性」的方式對原本的「男性」想像作出質疑和反思。更重要的是，女性家庭題材的湧現令到女性作家能夠「合法地」利用這種空間，重新改造原本被各種話語所利用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指出在「男性想像」下的「女性形象」的不真實，另一方面又賦予女性言說的機會。這些都必須隨著女性家庭題材的「合法性」才能出現。私人領域的題材在這一時期可以獨立存在，而不需借民族國家話語的名目存在。在戰爭的陰影下，日常生活成為文學作品在這個獨特的時空內少數「合法」的元素，女性作家則成為「合法」的發言人。就是這種種

⁶¹ Nicole Huang,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 p.50.

⁶² 關於這一方面的研究和討論可參 Nicole Huang,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 pp.50-83; 李曉紅：《女性的聲音：民國時期上海知識女性與大眾傳媒》（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 年），頁 188-240。

特殊的因素，造就張愛玲等女作家在上述場域中突圍而出的情況。

然而，如果結合場域的情況來看，上述有關女作家的寫作生存狀態是否如此正面呢？女作家在戰爭時期的上海可能得到發展的空間，但是同時也需要為此付出被想像、被形塑和被談論的代價。當然，女作家被想像被形塑的情況，在 1940 年代以前的上海文學場域也已經出現。以丁玲和白薇為例，她們的消息同樣被不少報章報導，但其報導角度和用詞較少與性或色情等方向連上關係，且大多比較正面。例如在上海出版的《女聲》就曾經刊登一篇叫〈丁玲小傳〉的文章，內裡對丁玲的報導正面，甚至用「丁玲可說是五卅以後的一個劃時代的典型女作家」。⁶³ 又例如在上海出版的《大眾畫報》於 1933 年曾刊登一篇〈丁玲所編之「大熊」〉都只是記錄丁玲失蹤的消息。⁶⁴ 再如 1936 年一篇於上海出版之《婦女生活》刊登的文章〈記白薇〉，內裡以同情的態度陳述白薇的遭遇。⁶⁵ 到 1941 年，上海文化場域內對白薇的想像仍然是以刻苦、悲劇等角度來書寫，例如〈記白薇：作家印象記〉中就對白薇有頗為客觀的記述。⁶⁶ 就算到了抗戰勝利後，報刊談及有關白薇被楊騷傳染性病的事，都較少以批評和調侃的角度出發，如 1946 年上海報刊《圖文》中就有一篇文章〈沈茲九暴露白薇隱病〉談及此事，但這篇文章只是批評沈茲九作為編輯披露白薇私隱屬錯誤行為，卻未見有對白薇加以

⁶³ 狄斯：〈丁玲小傳〉，《女聲》，第 2 卷第 17 期（1934 年 9 月），頁 8。

⁶⁴ 〈丁玲所編之「大熊」〉，《大眾畫報》，第 2 期（1933 年 12 月），頁 17。

⁶⁵ 子岡：〈記白薇〉，《婦女生活》，第 3 卷第 4 期（1936 年 2 月），頁 31。

⁶⁶ 苗埇：〈記白薇：作家印象記〉，《時代婦女》，創刊號（1941 年 12 月），頁 10-13。

嘲諷。⁶⁷ 如果把張愛玲的遭遇與上述兩位女作家比較，就可以看到，儘管張愛玲在場域中能有不少的出版機會，並受惠於這個時期的女性書寫空間，但是根深柢固的父權文化制度，以及強大的國族想像需求，仍然在不同方面利用女性形象為「男性」國家論述作出有利的書寫。在女性作家得到較大的發聲空間的同時，女性作家本身卻被集體想像塑造成「國家想像」的對立面，這往往通過把女性作家跟性連上關係而達到。張愛玲本人的遭遇，特別是她與「漢奸」論述連上關係，造成一種與丁玲和白薇等女作家不同的情況。以下本文將從抗戰勝利前和後的兩種輿論取向，對有關「張愛玲」其人其文的社會想像作出比較分析。

首先，我們可以見到不論在抗戰勝利前或後，場域中的各種勢力都傾向把「張愛玲」還原成一個女人，亦即不從文字或文學藝術去判斷她的成就，而大量談論她的外表和打扮，去把「她」想像成一個跟男性國族想像的他者，這種輿論不少更與性和色情連上關係。例如在 1944 年 8 月 24 日刊於《力報》的一篇文章〈《傳奇》印象〉，作者文海犁對《傳奇》內張愛玲的照片和簽名有著豐富的聯想：

研究張愛玲的簽字，是一條傾斜的打圈的曲線，頗有曲線美，不過，又像蚯蚓，又像蛇，這怕是張愛玲的標記，我覺得倒也說明了張愛玲作品的風格，曲折有致，極有誘惑力……且看照片，密司張的樣子倒蠻漂亮，斜著頭，頭髮像海一樣，微合著眼似的，有些像洛麗泰揚，好在「東方的洛麗泰揚」沒有，密司張可

67 〈沈茲九暴露白薇隱病〉：《圖文》，第 1 期（1946 年），頁 8。

以占領這頭銜。⁶⁸

從文海犁的文字可以看到，時人對張愛玲的性情和模樣有著無窮的好奇和聯想，他強調張愛玲的簽名像「蛇」一樣曲折有致，並同有誘惑力，把簽名跟性的聯想連上關係。由張愛玲的筆跡連繫到她的作品風格，這位作者更對張愛玲的相貌感到興趣，認為她長得有些像好萊塢電影明星洛麗泰揚（Loretta Young, 1913-2000）。最後，文海犁更直言「醉翁之意不在酒」，「讀者化了二百大洋好奇而看《傳奇》，而我想作者也是『醉婆名利雙收』，也並不希望讀者讀作品」。這篇文章把張愛玲的成功歸因於大眾對女性外表的想像，並抹殺了讀者對她的作品的內在欣賞，亦矮化了張愛玲的自我姿態。面對這種說法，張愛玲在 1945 年 2 月的〈「卷首玉照」及其他〉對這種心態有所回應：

印書而在裏面放一張照片，我未嘗不知道是不大上品，除非作者是托爾斯泰那樣的留著大白鬍鬚。但是我的小說集裏有照片，散文集裏也還是要有照片，理由是可想而知的。紙面上和我很熟悉的一些讀者大約願意看看我是什麼樣子，即使單行本裏的文章都在雜誌裏讀到了，也許還是要買一本回去，那麼我的書可以多銷兩本。我賺一點錢，可以徹底地休息幾個月，寫得少一點，好一點；這樣當心我自己，我想是對的。⁶⁹

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見到，張愛玲以一種十分實際的態度來回應這些讀者的心態，表明了她對這種大眾心態的自覺和利用，並扭

⁶⁸ 文海犁：〈《傳奇》印象〉，《力報》（1944 年 8 月 24 日），頁 3。

⁶⁹ 張愛玲：〈「卷首玉照」及其他〉，《天地》，第 17 期（1945 年 2 月），頁 15。

轉了讀者對她的名字的「性」的聯想的方向，重新導向了她作品中一貫對日常和人情的重視除了文海犁以外，對張愛玲的相貌感到興趣的還有曼厂，這位作者在 1945 年 1 月 4 日刊登的〈三個張愛玲〉中把張愛玲跟其他兩位同名同姓的女子的外貌作品評：

眼前張愛玲有三個，一個是舞女，面孔並不怎樣漂亮，更無籍籍之名……一個是電臺的播音員，據她本人自己說：「你們聽聽我的聲音怪好，可是你們見了我時，人都要嚇壞！」……還有一個，便是紅遍文壇的女作家了，她容貌並不傾城，可是文章卻全市轟動，到底如何，我們不去論她，不過三人之中，還是她比較那個！那個？那個什麼？我卻說不出了，嚟頭留給讀者諸君吧！⁷⁰

這裡曼厂把作為作家的張愛玲跟作為舞女的張愛玲連上關係，除了名字的相似性以外，亦在對女性外表的評論上把她們直接比較，而沒有對張愛玲的作品作出評價，討論的仍然是一直以來女性在男性心目中的傳統價值——色相；同時，文章更用「那個」這個含糊的說法引導讀者聯想，其取態與上述文海犁的相同。除此以外，在 1945 年 7 月 11 日的《光化日報》中，署名商朱的作者如此記載：

我和我的朋友又一天騎著腳踏車在街上玩。老遠我看見兩個窈窕的背影，我說那一定是張愛玲。我的朋友向來是張愛玲的喜愛者（我指文章），他很好奇，因此主張追上去看，他看見的是一個平凡的女子，只不過臉上多一付眼鏡，他變得

⁷⁰ 曼厂：〈三個張愛玲〉，《大上海報》（1945 年 1 月 4 日）。今收於蕭進編著：《舊聞新知張愛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9 年），頁 61-62。

失望，「因為，」他說，「我想看她是怎樣的奇裝異服。」而事實那天不過穿了一件普通的旗袍。我以為普通讀者仰慕一位作家的心理也是這樣的。真實與幻想之間有一段頗不短的距離……有許多讀者被她的作品所魅惑，以為她必是一個美人，至少和她作品中的人物一般美。少數人把她想成一個怪腔的女人……因為她的文字的美，便美在怪腔。⁷¹

這段文字反映了一種當時很普遍的讀者心理：對女作家的外貌和裝扮的想像和渴慕，跟觀看電影明星的心態十分相像。大眾對張愛玲的長相和衣著感到好奇，並因為女作家的長相不及文字般美而感到失望。

抗戰勝利前，不少人對女作家評頭品足，甚至對她們的名字大加議論，例如在 1943 年 11 月 16 日刊登的〈女作家〉，就對潘柳黛和張愛玲的名字大肆品評，例如評潘柳黛「其人不如讀其文佳，更不如見其潘柳黛名字佳」，對張愛玲的批評則是「張愛玲亦今日女作家，文章差潘柳黛遠甚，唯名字蕩冶，適與潘柳黛相反，論者謂此三字，不但蕩冶，且惡俗似貨腰女，如不知其能寫文章者見之，不當其舞女也者希。」⁷²除了簽名、外表、衣著以外，這篇文章再次顯示時人怎樣以名字把女作家跟色情連上關係。針對著這篇文章，張愛玲在 1944 年 1 月以〈必也正名乎〉對這篇文章作出回應：

我自己有一個惡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換一個……中國的一切都是太好聽，太順口了。固然，不中聽，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我願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為一種警告，設法除去一般知書

⁷¹ 商朱：〈看女作家〉，《光化日報》（1945 年 7 月 10 日），頁 2。

⁷² 醉雲：〈女作家〉，《力報》（1943 年 11 月 16 日），頁 3。

識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積習，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⁷³

這裡張愛玲再次以實際的、現實人生的角度去回應這些攻擊。通過這幾位作者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大眾怎樣把女作家跟社會上其他行業的女性並提，並且對她們的樣貌評頭品足，明顯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女作家的想像：女作家是作為城市的色情想像的其中一種資源，尤其是女性作家佔據了原本由男性主導的文學創作場域，這種「危及」男性地位的情況，必須通過父系制度的一系列手法來削弱她們帶來的威脅。而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把帶來威脅的女性塑造成色情的化身，把原本獨立的女作家客體化，使之成為受到注視及操縱的對象等手法，都可以使這些「危害」國族想像的女作家重新受到控制，儘管在這一時期，真正危害國族論述的是日本的入侵。場域中的各種勢力以這種手法把女作家「再現」，這種「再現」能夠把她們重新納入國族論述的想像和控制之中，女作家因此又重新被國族話語所塑造。

抗戰勝利後，更多的輿論傾向從張愛玲的穿著打扮和外表入手，把她塑造成為一個怪異的女性。這類文章在 1946 年間充斥各種雜誌和小報，例如 1946 年 3 月 17 日出版的一篇文章，題為〈張愛玲買橘子〉：

她的人外表上看起來雖然貴族而不大說話，其實出風頭的心，比任何人都要強，祇要看她穿的那些衣服就知道，在旗袍上，也許穿上一件清朝式滾花邊的棉背心或襖子……但她敢穿出來自然是膽量，所以有人說她心裡有點變態，正和她

⁷³ 張愛玲：〈必也正名乎〉，《雜誌》，第 12 卷 4 期（1944 年 1 月），頁 70-72。

愛胡蘭成一樣，但她的新異，卻至今使人轟動一時，勝利後，有人說她和胡逃了，有人說她仍在靜安寺某處居住，其實她沒有離開上海，依然在赫德路的一家公寓中和她姑姑住著，上星期，她一個兒在靜安寺路電車站邊買了一大紙袋福橘，她已不穿那奇裝，可是仍穿著一件藍布旗袍，穿上花緞鄞。⁷⁴

上述文字幾近揣測之詞，由她的打扮和服裝去品評她的為人，並把女作家的婚戀之事與這些品評之詞連上關係，令讀者有多方面的聯想。同樣，《申報》1946年3月18日內刊《香海》廣告，當中一篇文章題為〈張愛玲怪模怪樣〉。⁷⁵ 翻查同日出版的《香海畫報》中刊有一篇文章名為〈張愛玲怪模怪樣穿怪裝〉：

上海女人的服裝，近來突然復古，廢止旗袍，上面一件花花綠綠的棉襖，下面來一條男裝西裝袴，實行中西合璧，今古交流。

這種裝束的始作俑者是誰，上海人數典忘祖，知道的不多，說起來，這人也是鼎鼎大名的，是勝利前紅極一時的作家張愛玲。當時張舉行什麼招待晚會，就是穿了這種服裝出席的。張愛玲舉止和脾氣，陰陽怪氣，穿出來的衣裳也怪模怪樣……⁷⁶

上文以中西合璧的棉襖和西袴這種破壞傳統的穿著方法來類比女作家的行為和性格，同樣顯示了這種「特異」的女作家形象並不受抗戰勝利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文學場域歡迎。又例如 1946 年 3

⁷⁴ 路人：〈張愛玲買橘子〉，《海濤》，第7期（1946年3月17日），頁2。

⁷⁵ 上海申報館：〈《香海》廣告：張愛玲怪模怪樣〉，《申報》（1946年3月18日），頁2。

⁷⁶ 廣成：〈張愛玲怪模怪樣穿怪裝〉，《香海畫報》（1946年3月18日），頁5。

月 20 日一篇名為〈張愛玲刻意求工〉的文章批評道：

張愛就玲是一那未刻意求工的人，別說文章與談話，看她打扮就知道，果然燦爛得像朵花，反而是上海「畫綿里」一帶宮粉店裏所售的絹製假花。⁷⁷

這裡又是從張愛玲的打扮作批評，並以假花來嘲諷張愛玲的為人。上海場域中的謠言和猜測在 1946 年越趨劇烈和誇張，例如一篇〈張愛玲開壽衣店〉中所談論的都是無稽之談：

在勝利之前風頭十足的女作家張愛玲，此婆怪氣十足，文章裏南國的華貴氣味濃厚，最近極少寫作，或許是寫了不發表，最近傳說她已在電台上唱申曲，是開玩笑呢？是真有其事，怪人怪事，未當面見其演身說法者，這話難易斷定。

此婆平時穿的服裝，總是怪裏怪氣，中西璧合，前一個時期她曾計劃開設一爿時裝店，自勝利後，和她的文章一樣的無聲無臭了，有人計劃倘若張愛玲能夠開設一爿死人用的壽衣店，她的設計一定受摩登死人熱烈歡迎的。⁷⁸

上文所提到的張愛玲唱申曲一事，其實是當時上海有一同名同姓的播音員，多在電台上演唱申曲，這在上述〈三個張愛玲〉中已有提及。同時，上文提到張愛玲開設壽衣店根本並無其事，文章卻以這個道聽途說的消息來作嘲諷，可見當時場域中人旨在借張愛玲來宣泄。在不到一個月內，《申報》1946 年 3 月 31 日內刊《海派》

⁷⁷ 鳳三：〈張愛玲刻意求工〉，《星光》，創刊號（1946 年 3 月 20 日），頁 7。文中誤文應是排版錯誤造成。

⁷⁸ 周太太：〈張愛玲開壽衣店〉，《黑白》，第 2 期（1946 年 3 月 24 日），頁 4。

廣告，當中一篇文章題為〈張愛玲做吉普姑娘〉。⁷⁹ 翻查 1946 年 3 月 28 日出版的《海派》，內有一篇〈張愛玲做吉普女郎〉的文章，說：

前些時日，有人看見張愛玲濃□豔抹，坐在吉普車上。也有人看見她挽住一個美國軍官，在大光明看電影。不知真□的人，一定以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實像她那麼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個美國軍官做朋友有什麼希奇呢？⁸⁰

這裡以「吉普女郎」形容張愛玲，說她以濃妝豔抹來勾搭外國人，企圖用這種手法來強化張愛玲成為民族主義的對立面：她是一個不正經，並且勾結外國勢力的女人。

到了同年 4 月 27 日，《海濤》刊登了一篇〈張愛玲衣譜〉，作者如親眼目睹一般描述張愛玲將嫁予一個姓江的男人，嫁妝是一箱箱的「奇裝怪服」：

某週刊又傳張愛玲喜訊近，言之確實，對方據說是江某云云。這次好事成，張公館裏一箱一箱描金廣漆的皮箱嫁妝，內中滿裝了一襲襲奇裝怪服。新婚前夜，婆太太拾了一串白銅鑰匙，開出箱籠點嫁妝，噴出一陣樟木香，無心人在旁邊偷覷一二如下……⁸¹

在 1946 年 5 月 7 日，一則有關張愛玲結婚的報導也跟「奇裝異服」有關：

女作家張愛玲，據說快要做新嫁娘了，新郎官是一個也有貴族血液的蔣某，他們倆在開快車原則之下，婚事進行得十分

⁷⁹ 〈《海派》廣告：張愛玲做吉普姑娘〉，《申報》（1946 年 3 月 31 日），頁 2。

⁸⁰ 愛讀：〈張愛玲做吉普女郎〉，《海派》（1946 年 3 月 28 日），頁 5。

⁸¹ 無心：〈張愛玲衣譜〉，《海濤》，第 10 期（1946 年 4 月 27 日），頁 5。

順利。有人替她設計，結婚禮堂最好黃浦江裏的美國兵艦上，假使能夠得到盟軍將領的許可，比李阿毛女兒以前在水上飯店結婚，要彈硬得多了。

還有，張愛玲是一向以豔妝異服馳名文壇的，所以這一次她結婚時穿的禮服，也得動一些腦筋，筆者供獻一點意見，張女士大可穿南洋地方的紗籠，戴蒙古地方的草帽，披美國式的兜紗，著日本式的木履，再佩一把湯姆生手槍，保險可以轟動上海，替結婚時新娘禮服，另闢一個新的「反興」了。⁸²

結合兩段文字來看，當時文學場域內的輿論，集體地喜歡以婚嫁消息、奇裝異服、勾結外國勢力等角度來塑造這位抗戰勝利前當紅的女作家。這些報導不僅未得核實和確認真偽，有些甚至把各份小報上的傳言直接轉載報導。這只能說是反映了場域中某種強大的欲力所希望製造的效果。有關這種欲力的產生狀態，下文會有更深入的論述。

在 1946 年 7 月 18 日刊登的〈看見張愛玲〉一文，記錄了這篇文章的作者在街上遇見張愛玲的情況：

太陽晒得兇，張愛玲給晒得額汗涔涔，拿著手絹，輕輕地拭著，撐起小油紙傘，抬著頭，看傘上花紋。

記者乘她不備，欣賞一下她的裝飾。

還樸素，紫醬色印花綢旗袍，失去光彩的大皮包，還有平跟軟底鞋。

立在報攤旁，任意地翻閱，找題材吧！

翻了五分鐘，沒買，報販厭恨地看她一眼。有沒有想到她是

⁸² 定一：〈張愛玲結婚禮服設計〉，《海星》，第 12 期（1946 年 5 月 7 日），頁 9。

當代女作家？

電車來了，她已經等二十分鐘了哩。

弱不禁風的桂花身體竟也得擠得上了電車。

大家擠，擠得痛就呼娘喊爺；她始終緘默！

從成都路到靜安寺終站，她始終沒開口，買票時，是默默無聲地遞給鈔票，再默默無聲地接回票子。

想些什麼？

為什麼，儘向藍天望著，看浮雲？想過去麼？⁸³

這種不知真假的報導，可能頗受讀者歡迎。因為相隔十多天後，一篇差不多的文章以〈跟在張愛玲後面〉在《香雪海》刊登，當中對衣服的描寫和張愛玲態度的描述如出一轍。⁸⁴女作家在場域中成為被觀看的對象，並需要被公開地觀賞和品評。儘管張愛玲在抗戰勝利後已經更為低調，但小報的攻擊並沒有停止下來。在 1946 年 7 月 28 日，一篇題為〈張愛玲浪漫有法國風味〉更直接作出人身攻擊：

自命貴族血液的張愛玲大作家，現在已落魄了！……就是她喜歡打扮得奇奇怪怪，也就是打算出風頭主意，現在不料道成了落水狗！……衣服相當奇怪：「照會」，兩只眼睛向下吊，一張巨口，醜！家醜，自己醜，真醜！⁸⁵

上文的說法已屬人身攻擊，文章並配上張愛玲的照片，以今天的標準來說實有輿論欺凌之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文章對張愛玲的穿著有不同的聯想和惡評，例如 1946 年 8 月 4 日論及張愛玲的

⁸³ 白色記者：〈看見張愛玲〉，《海濤》，第 20 期（1946 年 7 月 18 日），頁 5。

⁸⁴ 蝟蝟：〈跟在張愛玲後面〉，《香雪海》，第 1 期（1946 年 7 月 31 日），頁 5。

⁸⁵ 琳丁丁：〈張愛玲浪漫有法國風味〉，《海晶》，第 22 期（1946 年 7 月 28 日），頁 9。

綉花鞋：「張小姐是愛戀東方古典味的服裝，她最愛穿繡花鞋，穿了更顯得她的美，據她自己說，她的腳，從小穿「緊襪套」所以足趾尖尖的，穿了繡花鞋再好看也沒有了……」⁸⁶、1947 年一篇題為〈張愛玲手套遮醜〉的文章則寫她的凍瘡：「因為她的雙手，凍瘡多得駭人，東疤西塊，此紅彼紫，看起來實在不美，所以就要借重手套，而時時帶上它了。」⁸⁷ 這些都是集中以外表打扮來形塑女作家的例子。

第二方面，女作家的婚戀消息和緋聞亦是場域內各種文化和政治勢力投射欲力的一個主要渠道。但是張愛玲所面對的被想像和被形塑的情況跟其他女作家並不相同。在張愛玲出道一年左右，胡蘭成曾經在 1944 年寫了一篇〈評張愛玲〉，稱張愛玲為貴族，流的是「貴族的血液」。⁸⁸ 自此，報界文壇常常以「貴族的血液」對張愛玲大加調侃，例如 1944 年 9 月 20 日的《海報》中有一篇〈貴族血〉，筆者以自己流著「豆油血液」，諷刺胡蘭成的「狂捧作家語妙絕」，又認為「此是賣文非賣血」；⁸⁹ 抗戰勝利前夕，又有人重提張愛玲懂得配合愛好噱頭的上海人，其貴族身世亦是噱頭之一；⁹⁰ 也有署名真西哲的作者評胡蘭成跟唐吉珂德相似，因為他「迷信於

⁸⁶ 赫金：〈張愛玲的綉花鞋〉，《國際新聞畫報》，第 50 期（1946 年 8 月 4 日），頁 10。

⁸⁷ 〈張愛玲手套遮醜！！〉，《海潮周報》，第 55 期（1947 年 6 月 30 日），頁 8。

⁸⁸ 胡蘭成：〈評張愛玲〉，《雜誌》，第 13 卷第 2、第 3 期（1944 年 5 月、6 月），頁 76-81、頁 79-82。

⁸⁹ 半老書生：〈貴族血〉，《海報》（1944 年 9 月 20 日），頁 2。

⁹⁰ 子曰：〈張愛玲之貴族身世〉，《東方日報》（1945 年 4 月 12 日），頁 2。

張愛玲的貴族血統。」⁹¹ 抗戰勝利後，亦有人重提「貴族血液」女作家重新出版《傳奇》和《流言》的消息。⁹²

抗戰勝利後，輿論的焦點都轉到張愛玲跟胡蘭成的婚姻之上，重提「張愛玲之『看中』胡蘭成原是胡的『捧力』所致。」；⁹³ 有的人則猜測她的前途：「而胡蘭成已經被拘禁，張愛玲則只好再嫁了，雖然她愛打扮，尤其愛著奇裝異服，可是一只面孔文藝氣息太濃厚了，誰也沒有追求胃口，於是乎宣告擱淺法（去）了，當然在這春天張愛玲，苦悶得要死……不過『描金鳳』是完成了，她又。（寫？）了個短篇，名『徵婚』那大約是寫出她的性的苦悶」；⁹⁴ 又有對她作人身攻擊的文章：「真的，張愛玲是一個歇斯底里的女人，尤其是胡蘭成入牢監以後，張的性欲苦悶已是到了頂點。」⁹⁵ 根據陳子善的研究，抗戰勝利後出版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女漢奸醜史》，另一本是《女漢奸臉譜》，當中都把張愛玲跟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吳四寶等汪偽政權人物的妻子以「女漢奸」並論。1945年11月更有《文化漢奸罪惡史》出版，甚至稱張愛玲為「娼妓式的女文人」。⁹⁶

⁹¹ 真西哲：〈論胡蘭成與張愛玲〉，《海報》（1944年9月6日），頁2。

⁹² 上官燕：〈貴族血液的大膽女作家——張愛玲重述連環套〉，《上海灘》，第16期（1946年9月22日），頁4。

⁹³ 章緒：〈附逆未遂之女作家——張愛玲琵琶別抱〉，《大觀園周報》，第10期（1946年2月22日），頁7。

⁹⁴ 馬川：〈張愛玲徵婚〉，《上海灘》，第1期（1946年4月1日），頁2。

⁹⁵ 諸葛：〈張愛玲嗜吃臭豆腐〉，《上海灘》，第20期（1946年10月23日），頁12。

⁹⁶ 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可參陳子善：〈1945-1949年間的張愛玲〉，收入林幸謙編：《張愛玲：文學·電影·舞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7-57。

在大量相關的文章中，其中較多討論的是「願為使君第三妾！」這一說法。在 1945 年 11 月 9 日，《精華》刊登了一篇名為〈張愛玲寫信給胡蘭成說：「願為使君第三妾！」〉的文章，內裡提及張愛玲向胡蘭成表示「願為使君第三妾！」⁹⁷自此，不少文章都常以這句話來嘲諷張愛玲，例如穩尚一篇名為〈從張愛玲說到禁止娶小老婆〉的文章，於 1945 年 12 月 10 日刊登，當中寫道：

「願為使君第三妾」，這是多麼無恥的話啊！但竟出於一個堂堂的女作家之口，真令人啼笑皆非……張愛玲既有寫作的天才，何患不能成名，更何患沒有丈夫，為什麼要做小老婆？⁹⁸

其後，大量有關的文章都不斷關心張愛玲的婚戀消息，例如 1946 年 2 月 22 日《大觀園周報》刊登〈附逆未遂之女作家：張愛玲琵琶別抱〉：「勝利後，胡逆潛匿，而張則改絃更張，琵琶別抱，正埋頭寫作，以求新的如意郎君，實一附逆未遂之女『作家』。」⁹⁹、1946 年 3 月 29 日《申報》刊登了《東南風》的廣告，廣告內寫「張愛玲甘心作妾」¹⁰⁰、於 1946 年 3 月 28 日出版的《東南風》則有文章〈胡蘭成秀才造反 張愛玲甘心作妾〉一文、¹⁰¹於 1946 年 4 月 1 日

⁹⁷ 〈張愛玲寫信給胡蘭成說：「願為使君第三妾！」〉，《精華》，第 1 卷第 11 期（1945 年 11 月 9 日），封四頁。

⁹⁸ 穩尚：〈從張愛玲說到禁止娶小老婆〉，《永生》，第 7 期（1945 年 12 月 10 日），頁 13。

⁹⁹ 章緒：〈附逆未遂之女作家：張愛玲琵琶別抱〉，《大觀園周報》，第 10 期（1946 年 2 月 22 日），頁 7。

¹⁰⁰ 〈《東南風》廣告：張愛玲甘心作妾〉，上海申報館：《申報》（1946 年 3 月 29 日），頁 1。

¹⁰¹ 一士：〈胡蘭成秀才造反 張愛玲甘心作妾〉，《東南風》（1946 年 3 月

的一篇〈張愛玲徵婚〉、1946年4月12日〈胡蘭成難償相思願——蔣果儒勒馬、張愛玲失戀〉談到胡蘭成在與張愛玲談戀愛之前，曾因欣賞蔣果儒文采而送一封逾三千字的情書撩撥。¹⁰²

又例如 1946 年 4 月 13 日刊登的〈張愛玲遭嫁有期〉：

在敵偽時代有「文壇女縱橫」一句術話，原是指的蘇青與張愛玲，蓋當時張蘇兩女，頗能叫座。如戰國時蘇秦張儀也。然而各有撐腰文人在後，蘇青陶亢德與柳雨生。張則有與袁殊與胡蘭成。四男兩女，皆有密切關係，於是在袁殊的「什誌」上，有張愛玲論，在柳雨生的「風雨談」上，有蘇青論。捧得蘇張兩位女士渾淘淘的，以致蘇青自己宣佈：「曾經與陶柳三人同一床。」張愛玲則硬要做胡蘭成「小之又小」而未得……這還不算，就是她的姑姑以「張愛玲不能不結婚了」，在親友中物色了一位如意郎君江某，經介紹他們相識之後……便一拍即合，大致在全國民眾弔屈大夫的日期，便是他們江張兩府在紅運樓上舉行嘉禮之日。¹⁰³

這篇文章把張愛玲與蘇青的文學成就與依傍男人連上關係，末尾更把張愛玲與一姓江的男士結婚的消息寫得言之鑿鑿。還有 1946 年 4 月 18 日〈張愛玲「安定登」〉：

自詡血管里流著「貴族血液」的張愛玲，本來沒有什麼大罪，就因為和倚老賣老的「狗屁政論家」胡蘭成「攪七念三」，於是「文化漢奸」的大帽子也加在張愛玲頭上了，女孩子總

28 日），頁 2。

¹⁰² 未老：〈胡蘭成難償相思願——蔣果儒勒馬、張愛玲失戀〉，《海花》，第 3 期（1946 年 4 月 12 日），頁 6。

¹⁰³ 一廉：〈張愛玲遭嫁有期〉，《海風》，第 22 期（1946 年 4 月 13 日），頁 2。

是貪慕虛榮，她自己沒有細加考慮，跟著捧的人跑，只得怪自己不好。¹⁰⁴

文章先嘲笑張愛玲的「貴族血液」，然後以「貪慕虛榮」等字眼，定調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戀。後來，胡蘭成在抗衡勝利後出逃，報刊文章就轉為嘲笑張愛玲寂寞、獨守空房。

要把一個女作家的神聖光環除下，莫過於把她的失戀和寂寞大肆渲染，把她還原為一個平凡的女性。在 1946 年 4 月 18 日《申報》刊登了《海晶》的廣告，廣告內寫「張愛玲相戀貴公子」。¹⁰⁵同日《海晶》有一篇同名文章：

有貴族血液的張愛玲，現在是墮入苦悶的深淵，因為胡蘭成已悄悄溜往陝北，讓她孤另另地丟在上海，而她的稿子又無出路，寫得雖多，雖好，也只有給自己欣賞。

因此她是寂寞悵鬱的，在淒清之中排遣悠長的歲月，然而最近卻不然，她的住所突然熱鬧起來了，原來有一位貴公子自重慶飛來，說起來他們是親戚，只是疏遠已八年多了，這次因久慕她的大名特來拜訪，而張愛玲獨守空閨，有佳賓來臨，自然是受寵若驚，一個深情，一個意深，兩人自然熱絡起來。¹⁰⁶

文章把張愛玲塑造成一個寂寞悵鬱、被拋棄的女人，正等待著「貴公子」的到來把她拯救出來。兩日後，又有一篇文章從相反的

¹⁰⁴ 良廷：〈張愛玲「安定登」〉，《是非》，第 4 期（1946 年 4 月 18 日），頁 9。

¹⁰⁵ 〈《海晶》廣告：張愛玲相戀貴公子〉，《申報》（1946 年 4 月 18 日），頁 2。

¹⁰⁶ 漢公：〈張愛玲相戀貴公子〉，《海晶》，第 9 期（1946 年 4 月 18 日），頁 8。

角度寫張愛玲遠赴蘇北尋找胡蘭成。這篇刊登於 1946 年 4 月 20 日的〈張愛玲千里尋情人〉如此描述：

胡蘭成在上海時，就與張愛玲打得火熱卿卿我我，早超過普通友誼以上，如今胡蘭成遠走高飛，留下張愛玲依照住在上海未免感到有些寂寞吧！據說她已下了決心，在短期內，將赴蘇北尋胡蘭成去了！

女人大多是多情的。¹⁰⁷

文末一句「女人大多是多情的」，把女作家本來只是在場域中提供文學作品的功能，變成提供私生活和娛樂的談資，同時女作家本身也變成一個被談論的對象。在經歷 1946 年大肆對張愛玲的攻擊以後，到了 1947 年，張愛玲成功編寫《不了情》電影劇本後，由於其成功，報章上的輿論一改方向，都以報導電影消息為主。有關她的緋聞，則要到 1949 年才又見到談論她與桑弧的戀愛消息。例如在 1949 年 4 月 30 日，一篇〈桑弧張愛玲兩情綿綿〉的文章，報導了兩人戀愛的消息。¹⁰⁸

抗戰勝利後，報章上有關張愛玲的報導比之前更多，差不都一兩天就有一次報導，有時甚至在同一天幾份報章同時都有論及她。這種情況集中於 1946 年，例如在這一年的 3 月和 4 月短短兩個月內，上海大量報章雜誌都刊登了大量有關張愛玲的評論，其中不少從異聞奇事的角度，把張愛玲包裝成神秘女子。例如《申報》1946 年 3 月 6 日內刊《海光》廣告，當中一篇文章題為〈女作家張愛玲 失

¹⁰⁷ 鐵郎：〈張愛玲千里尋情人〉，《海濤》，第 9 期（1946 年 4 月 20 日），頁 9。

¹⁰⁸ 〈名導演愛上女作家：桑弧張愛玲兩情綿綿〉，《青春電影》，第 17 卷（1949 年 4 月 30 日），頁 1。

踪)。¹⁰⁹ 按同日《海光》中則有友蘭所寫的〈張愛玲失蹤〉一文：
女作家張愛玲，文筆清麗。惜交友不慎，玷及清譽。故於勝利以後，渠即自慚不遑，未便更以作品問世。迨至近時，有人就其寓所，數往訪候，輒不見影蹤。再三詢之女僕，但言其早於月前悄然遠引，亦不知何往。由是「張愛玲失蹤」一說，遂爾傳遍眾口矣！¹¹⁰

這篇文章以「交友不慎，玷及清譽」形容張愛玲，並把張愛玲的行蹤大肆渲染成充滿神秘感的事，把她包裝成為一個行跡可疑的女子。數日後，於1946年3月14日，又有《申報》內刊《海晶》廣告，當中一篇文章題為〈張愛玲行踪之秘〉。¹¹¹ 同日《海晶》則刊有由呵呵所寫的〈胡蘭成生死未卜 張愛玲行踪之謎〉一文：

漢口捉漢奸很利害，獨有胡蘭成漏了網。一說他在天津被捕，又聞胡已投奔中共，躲在「解放區」。到底怎樣，還是不清楚。不過急壞了他在上海的愛人張愛玲，對胡的生死存亡，甚為憂疑。有人問她胡的消息，終是回答不知道。

最近常常有人慕名到張的公館去尋她，終是被一位蘇州娘姨，擋駕，上個月說：「妮小姐勤拉醫院裡響生病。」這個月說：「妮小姐到鄉下去哉！」張愛玲行蹤也像胡蘭成那樣神秘起來了。¹¹²

這篇文章同樣把張愛玲的行蹤神秘化起來，伴隨著對她和胡蘭成的婚戀事情的聯想和猜測。

¹⁰⁹ 〈《海光》廣告：女作家張愛玲失蹤〉，《申報》（1946年3月6日），頁1。

¹¹⁰ 友蘭：〈張愛玲失蹤〉，《海光》，第14期（1946年3月6日），頁2。

¹¹¹ 〈《海晶》廣告：張愛玲行踪之秘〉，《申報》（1946年3月14日），頁2。

¹¹² 呵呵：〈胡蘭成生死未卜 張愛玲行踪之謎〉，《海晶》，第4期（1946年3月14日），頁5。

場域中除了把張愛玲塑造成神秘難測的女性外，亦常以色情和愛慾的角度去描寫這位女作家。在 1946 年 3 月 18 日的〈張愛玲從此孤枕難眠〉一文，就可見到場域內如何把私領域的事作公共領域的談資。文章開宗明義以「色情」、「猥褻」、「床第私事」、「大膽作風」、「紅牌」等字眼去描寫張愛玲和蘇青：

在淪陷期中，上海產生了好幾個所謂「女作家」，她們唯一的作風，就是以色情作號召，所以寫得越猥褻，越出風頭，有幾個連她們的床第私事，也形之於筆墨，所謂「大膽作風」，便是她們的傑作。因此，像蘇青，張愛玲等輩，居然「芳名」傳播一時。而張愛玲的大作，竟然以「第一流」「紅牌」頭銜，擠進了當時的「偽文壇」。¹¹³

除了以色情角度，連女作家的便溺之事也成為報刊文章的報導資料，例如在 1946 年 4 月 1 日刊登的〈張愛玲·欣賞名勝、解決小便〉：

蘇青提到她的同行張愛玲的小便問題。蘇青說：她自己最怕多走路，路走多了，屎也就急了，可是張愛玲碰到多走路，尿就急了。張愛玲對蘇青說：「我最不歡喜出門旅行，除非萬不得已，我總不出遠門的。假如出門的話，到了某一個地方，別人在那裡趕著欣賞名勝，我卻忙著先找可以解決小便的處所，因此別人問我看見了什麼，我並不知道。我那裏有心去看風景呢，假若找不著地方小便……」¹¹⁴

¹¹³ 木樛兒：〈張愛玲從此孤枕獨眠〉，《風光》，第 2 期（1946 年 3 月 18 日），頁 9。

¹¹⁴ 風聞：〈張愛玲·欣賞名勝、解決小便〉，《香海畫報》，第 3 期（1946 年 4 月 1 日），頁 2。

這篇文章非常清楚地顯示了當時場域中如何把女作家的私事公開談論，甚至便溺這種極為私人的日常小事也逃不出被討論的命運。

除此之外，女作家在場域中甚至需要面對被公開示愛和調情的情況。在 1946 年 5 月 14 日的在「女作家情書特輯」中，有一位讀者寫了〈煩交張愛玲女士〉的「情信」刊登在《上海灘》中：

愛玲姊姊：

請原諒我，肉麻的稱呼你，實在的，我似乎做了許多夢，為了你。

你的溫馨的臉蛋，你的秀麗的髮絲，你的纖手，你的纖腿，沒有一部份不美，是詩的結晶。

可是文章是更美的，你所寫的分析男人的文章，是多麼偏重心理的研究，而你美妙的散文，好像一個吃醉了酒的少婦，是多麼的世紀末底，我也好像吃醉了酒……¹¹⁵

這個「女作家情書特輯」中不只刊有給張愛玲的情書，還有給蘇青、白玉薇、王淵、程育真、張宛青、丁芝、潘柳黛、蘭兒、姚玲、施濟美、謝千夢、周鍊霞等女作家的情書。（見圖一及二）這就可以見到，「女作家」在當時的文學場域中是一種可供公開示愛、宣泄欲念的對象，讀者在這個公共領域閱讀這種公開的情書時，就如同參與一種集體的調戲和發泄，為讀者帶來一種另類的「娛樂」。如果把蘇青和張愛玲兩位當時得令的女作家比較，就更可以看到場域內對女作家想像方向之異同。從本文所收集的資料來看，蘇青和潘柳黛等女作家被談論的次數與張愛玲相若，且同樣在抗戰勝利後的一年間成為被談論的焦點，這些報導主要集中在 1946 年。但是

¹¹⁵ 〈煩交張愛玲女士〉，《上海灘》，第 5 期（1946 年 5 月 14 日），頁 6。

從總的方向來說，蘇青雖間有被連結去性的議題之上，例如一篇〈蘇青讚美陳公搏鼻頭〉的小報文章有惹人聯想蘇青與陳公搏的關係之嫌，但整體來說大多數的報刊文章都是圍繞蘇青的瑣碎日常和離婚生活等；而有關潘柳黛的報導，雖然亦有關於她的婚戀消息，特別是她和上海約翰大學教授李延齡的戀情以及其後婚變的消息，但總體來說，其多為調侃之語，最嚴厲的也只是如〈紅記者！紅作家！潘柳黛遭人檢舉〉一文中批評她有附逆之嫌，連帶批評她的私生活之腐化，但也只能從她的丈夫李延齡之離異入手。¹¹⁶ 這種批評嚴厲程度之分別是由於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姻關係，令張愛玲具有更大「危害」國族的嫌疑。這些都反映在當時報刊所代表的集體想像之中。

當然，本文所提到的多種報刊，絕大部分對張愛玲進行想像和形塑的都是上海小報，當中不少是以短期卻密集的方式出版，特別是抗戰勝利以後的爆發式出版，例如《海花》、《海濤》、《海光》、《海派》、《海星》、《海晶》等以「海」字為報刊名稱的小報，大部分都是於 1945 年創刊、1946 年停刊，這些報刊多以周刊形式出版，故此有的在不足一期的出版年內，卻有超過 30 期出版，例如《海風》創刊於 1945 年 11 月，停刊於 1946 年 8 月，卻總共出了 36 期。¹¹⁷ 這種小報密集出版的情況可以解釋為何有關張愛玲的

¹¹⁶ 李四：〈紅記者！紅作家！潘柳黛遭人檢舉〉，《銀都》，復第 1 期（1946 年），頁 1。

¹¹⁷ 這幾本刊物的出版年份如下：《海花》（1946 年 3 月-1946 年 4 月，共 4 期）、《海濤》（1946 年 2 月-1947 年 2 月，1948 年 8 月-1948 年 9 月，共 45 期）、《海光》（1945 年 12 月-1946 年 7 月，共 33 期）、《海派》（1946 年 3 月-1946 年 4 月，共 3 期）、《海星》（1946 年 2 月-1946 年 10 月，共 27 期）、《海晶》（1946 年 2 月-1947 年 12 月，期數不詳）、《海風》（1945 年 11 月-1946

報導在抗戰後突然激增。另外，個別小報的讀者群雖然不多，根據 1943 年《雜誌》所刊之〈上海的小型報文化座談會〉所記，一般較好銷量的小報每期有 7000 份左右，更佳的會有 10000-20000 份的銷量；而這些小報的讀者多以「寫字間職員」為多，主要為消遣的性質。¹¹⁸ 但是考慮到上海文化場域中的小報數量眾多，結合上述的情況，可以想像整體讀者群的數量不少，甚能代表場域中的主流社會想像。¹¹⁹

查爾斯·泰勒曾說明，他運用「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 一詞，在於這個詞指的是一般人對社會的想像，這種想像並未經系統的理論分析和整理，而經由圖像、故事及傳說所承載。這種想像跟理論只有少數人所理解不同，它為社會中大部分人所共享。¹²⁰ 這種情況，非常適用於分析張愛玲於上海時期的場域狀態，因為當中大部分人對其人或其作品的想像，大多通過流言、傳說、小道消息等流播並凝聚；同時，這種社會想像往往包括人們對群體的一種期望和欲望；查爾斯·泰勒更指出，這種社會想像的實踐，往往是群體之間都有一種固定遵守的戲碼(repertory)，人們知道某種集體行動應該如何進行，彼此都在一種社會空間的默會地圖(implicit

年 8 月，共 36 期)。

¹¹⁸ 〈上海的小型報文化座談會〉，《雜誌》，第 11 卷第 6 期(1943 年 9 月號)，頁 10-15。

¹¹⁹ 在這一時期的文化場域內，除了報章的集體想像，亦有不少有關「女漢奸」的書籍出版，雖然這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列，但亦可顯示場域內的想像方向。相關研究可參陳子善：〈1945-1949 年間的張愛玲〉，收入林幸謙編：《張愛玲：文學·電影·舞台》，頁 47-57。

¹²⁰ 查爾斯·泰勒著、李尚遠譯：《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臺北：商周出版社，2008 年)，頁 48。

map of social space) 中去作出決定和區分。按照這種說明，張愛玲身處的場域中所包括的社會想像，是一種有默契的、集體的決定，人們之間有某種共識：我們可以這樣去想像、形塑這一種「女作家」。

查爾斯·泰勒認為，人們通過言談來與他人交流並產生聯繫，這種言詞行動 (speech act) 具有力量，通過它特定的模式，表現了人們與受話者的關係和地位。這種言談能留下印象，並且在多數情況下，它假定受話者是能夠被說服的。這通通最後都歸結到人們如何通過想像去發現自己在這種敘事中的位置，以及相關的權力網。¹²¹ 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發覺，張愛玲作為一個女作家，在這種社會想像之中，處於一個被談論的位置，各種各樣的人們具有一種權力，或通過報章這個公共空間 (public spaces)，去談論，同時也是一種形塑的權力，去把女作家變成一種公共的談資，一方面這彰顯了人們的權力，另一方面則顯示了人們默認的一種狀態：女作家成為了公眾人物，選擇這種職業就等於默認需要付出這種被談論和被想像的代價。

在日本於 1945 年無條件投降之前，社會需要把「張愛玲」與其他女作家一樣，想像成一種可供討論的、公眾的女性形象，並通過這種說明去宣泄一種社會的欲力。按照古蒼梧的研究，當整個上海在 1942 年進入淪陷時期後，在極有限的自由下，反而創造出一個空間令鴛鴦蝴蝶派與個人主義色彩較濃的作家得到發揮空間，而新文學傳統的載道派卻被迫偃旗息鼓。¹²² 但是，如果結合場域內的

¹²¹ 查爾斯·泰勒著、李尚遠譯：《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頁 52-53。

¹²² 古蒼梧：《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張愛玲、蘇青、胡蘭成的上海》，頁 56。

各種報章報導來看，卻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輿論對張愛玲和胡蘭成進行討論和諷刺。如此看來，按照古蒼悟的說法，雖然張愛玲較多發表作品的《古今》、《天地》、《雜誌》等都沒有明確宣傳大東亞文學，但是，場域內的人把張愛玲看成是胡蘭成、柳雨生等人的陣營，並且在抗戰勝利前後的報章之中把一種不能直言的欲力發泄於「張愛玲」之上，並且把她塑造成一種異質他者的取向，是無容置疑的。這種集體的想像和形構，具有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特質，亦反映這個場域中的精神現象。

四、結語

從上文的討論讓我們看到，張愛玲的成功既有來自於場域中各種因素，包括出版社和編輯對她的青睞、文人間的互相吹捧、利用輿論去促銷等；但同時場域中的各種力量亦會因應政治欲力、勢力利益等去攻擊和破壞，從而爭奪場域中的話語權，形成形形色色的勢力關係網。張愛玲早年寫作成功的現象得益於淪陷區獨特的文學場域狀況。但是，在場域的另一面，女作家仍然成為大眾的集體色情想像的對象，女性形象的塑造連繫的是現代中國這一民族的生存狀況。雖然上海文學場域著力想像和塑造女作家形象的情況早於 1930 年代已經很常見，然而，當時的報刊（特別是小報）對女作家的想像較少色情，卻是從賢妻良母的傳統女性形象入手去把女作家與國族連結，例如把丁玲塑造成不善處理家庭，且和丈夫爭吵的「反面形象」；或是把冰心想像成典型的傳統女性，從正面的角度去想像她具有母親、女秀才的形象。¹²³ 這一點構成了與本文所論述的抗

¹²³ 有關 1930 年代上海小報對女作家的想像，參見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

戰前後上海文化場域的明顯區別：由於 1930 年代早期未有日本入侵的明顯危機意識，故此把特定女作家想像成危害國族的符號的需求仍然未見急切，場域需要建立傳統賢妻良母的女性形象來加強國族論述。但是隨著日本入侵的情況越趨激烈，文學場域內對女作家之想像角度明顯轉趨更為極端，色情與國族想像的連結更為明確。加上上海報刊，特別是小報為求生存，往往會跟隨大眾的口味和方向而行，因此，抗戰後國族想像在場域內急促發展，令張愛玲這位與「漢奸」論述連上關係的女作家更容易成為被想像和被形構的資源，這種情況體現在上海小報本身具備的「窺視」、「八卦」的性質以外，更加入了「欺凌」和「譴責」的特徵，這構成了與過去上海文化場域報章生態的明顯分別。

劉紀蕙曾經討論過，國家論述是線性歷史觀之下中國為了彌補落後感和自卑心而興起的產物。這種以「國家」作為欲望之補償的情況，造成了 1930 至 1940 年代中國對國族狂熱的認同。借助這一說法有助理解上文提及到的場域中的欲力，這種欲力導向以國族認同為中心的同質化，任何危害這種同質化的元素都會被視為異質之物，從而被排斥和消滅。¹²⁴ 依據這一思路，就可以明白為何同為女作家，丁玲和白薇儘管同樣具有被想像和被形塑的婚戀、性別題材，但是由於其與國家論述的同一陣線，並且被想像成新文學的陣營，符合了現代中國「正統」的想像需要，因此她們並不曾遭受如張愛玲一般被色情化和性別化的想像；而蘇青和潘柳黛，亦由於跟「危

海小報和小報中的名人》，《中國讀書報》（2004 年 1 月 16 日），以及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78-197。

¹²⁴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頁 9-25。

害」「國族」的「偽政權」連上關係，因此她們同樣在抗戰勝利後，面臨一種積壓甚深而反彈的欲力所想像和形塑，成為當時同樣被批評的對象。然而，由於她們始終沒有如張愛玲與胡蘭成婚戀的「確鑿」事實，因此她們被攻擊的力度，或是被想像的方向，始終不及張愛玲所面對的那麼極端。

通過上述的分析，可以讓我們看到在包括國族和性別想像在 1943-1949 年的上海文學場域中，張愛玲的女性形象如何被國族論述所運用，反映出時人在動蕩變化的中國現代歷史場境中的想像。上述的攻擊和批評都顯示了抗戰勝利前一貫對女作家的想像，就是對她們作出性和色情的想像。在抗戰勝利前，場域通過把女作家色情化的手法，化解場域內的成員對失去領土的焦慮，這種心理往往把女作家以色慾的方法塑造，同時把她們打造為危害國族利益的不忠誠女子。在抗戰勝利後，「國家」收復失去的領土，場域內的勢力立即要進行清算，要處理這些在「國家危難」時紅遍上海的女作家，最好的方式同樣是以「性」的角度去塑造她們的形象，透過強調女作家在性方面的不滿足，或把她們寫成娼妓，來處理這些曾經直接或間接跟殖民者有聯繫的女性，報復她們對「國族」的不忠誠。在面對場域需要把「張愛玲」本身想像成漢奸的形勢下，作為女作家的張愛玲本身，由名字到外貌、婚戀到便溺等私領域的話題，都一一於場域中被想像和形塑，這種特殊的狀態亦顯示了張愛玲這位女作家的案例與其他女作家的不同，亦可見到場域內的各種勢力如何主宰女作家被想像和被形塑的方向和力量。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古蒼梧：《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張愛玲、蘇青、胡蘭成的上海》，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2. 布赫迪厄著，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3. 布赫迪厄、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年。
4. 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5. 李曉紅：《女性的聲音：民國時期上海知識女性與大眾傳媒》，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年。
6. 邵迎建：〈張愛玲和「新東方」〉，《回望張愛玲·昨夜月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
7.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
8. 查爾斯·泰勒著，李尚遠譯：《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臺北：商周出版社，2008年。
9. 柯靈：〈遙寄張愛玲〉，《私語張愛玲》，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
10. 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
11. 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張愛玲私語錄》，香港：皇冠出

- 版社，2010 年。
12. 張愛玲：《流言》，香港：皇冠出版社，1998 年。
 13. 張愛玲：〈論寫作〉，《張看》，香港：皇冠出版社，2000 年。
 14. 曼厂：〈三個張愛玲〉，蕭進編著：《舊聞新知張愛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5. 陳子善：〈1945-1949 年間的張愛玲〉，林幸謙編：《張愛玲：文學·電影·舞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6. 陳建華：〈豈止「消閑」：周瘦鵑與 1920 年代上海文學公共空間〉，姜進主編：《都市文化中的現代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7. 楊佳嫻：《懸崖上的花園：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 年。
 18. 劉心皇：《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 年。
 19.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
 20.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
 21. 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9.
 22. Huang, Nicole.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

二、報章雜誌

1. 上海申報館：〈《東南風》廣告：張愛玲甘心作妾〉，《申報》，1946年3月29日，頁1。
2. 上海申報館：〈《香海》廣告：張愛玲怪模怪樣〉，《申報》，1946年3月18日，頁2。
3. 上海申報館：〈《海光》廣告：女作家張愛玲失蹤〉，《申報》，1946年3月6日，頁1。
4. 上海申報館：〈《海派》廣告：張愛玲做吉普姑娘〉，《申報》，1946年3月31日，頁2。
5. 上海申報館：〈《海晶》廣告：張愛玲行踪之秘〉，《申報》，1946年3月14日，頁2。
6. 上海申報館：〈《海晶》廣告：張愛玲相戀貴公子〉，《申報》，1946年4月18日，頁2。
7. 〈丁玲所編之「大熊」〉，《大眾畫報》，1933年12月，第2期，頁17。
8. 〈上海的小型報文化座談會〉，《雜誌》，第11卷第6期，1943年9月，頁10-15。
9. 〈口碑載道！〉，《申報》，1945年6月21日，第一張。
10. 〈女作家聚談會〉，《雜誌》，第13卷第1期，1944年4月，頁54-62。
11. 〈中日文協舉行女作家座談會——晚間設宴招待小林秀雄氏〉，上海申報館：《申報》，1944年2月8日，第一張。
12. 上海申報館：〈文學者大會滬代表決定〉，《申報》，1944年10月8日，第一張。

13. 〈名導演愛上女作家：桑弧張愛玲兩情綿綿〉，《青春電影》1949 年第 17 卷，1949 年 4 月 30 日，頁 1。
14. 〈好評所歸！〉，《申報》，1945 年 6 月 6 日，第一張。
15. 〈沈茲九暴露白薇隱病〉：《圖文》，1946 年第 1 期，頁 8。
16. 〈我們該寫什麼？·特輯前言〉，《雜誌》，第 13 卷第 5 期，1944 年 8 月 10 日，頁 9-18。
17. 〈納涼會記〉，《雜誌》，第 15 卷第 5 期，1945 年 8 月，頁 70-75。
18. 〈張愛玲手套遮醜！！〉，《海潮周報》，第 55 期，1947 年 6 月 30 日，頁 8。
19. 〈張愛玲怎樣看蘇青？〉，《光化日報》，1945 年 4 月 20 日，頁 2。
20. 〈張愛玲寫信給胡蘭成說：「願為使君第三妾！」〉，《精華》，第 1 卷第 11 期，1945 年 11 月 9 日，封四頁。
21. 〈煩交張愛玲女士〉，《上海灘》，第 5 期，1946 年 5 月 14 日，頁 6。
22. 〈蘇青張愛玲對談記——關於婦女·家庭·婚姻諸問題〉，《雜誌》，1945 年第 14 卷第 6 期，頁 83-89。
23. 〈讀者之聲——說張愛玲·一〉，《現代周報》，第 3 卷第 10 期，1945 年 4 月 14 日，頁 35。
24. 〈讀者之聲——關於張愛玲等〉，《現代周報》，第 3 卷第 8 期，1945 年 3 月 31 日，頁 36。
25. 「湖山外篇」專欄：〈蘇青與張愛玲〉，《繁華報》，1945 年 3 月 28 日，頁 2。
26. 一士：〈胡蘭成秀才造反 張愛玲甘心作妾〉，《東南風》，

- 第 2 期，1946 年 3 月 28 日，頁 2。
27. 一之：〈張愛玲改名連雲 蘇青忘不了「天地」〉，《香海畫報》第 5 期，1946 年 4 月 15 日，頁 54。
28. 一廉：〈張愛玲遭嫁有期〉，《海風》，第 22 期，1946 年 4 月 13 日，頁 2。
29. 上官燕：〈貴族血液的大膽女作家——張愛玲重述連環套〉，《上海灘》，第 16 期，1946 年 9 月 22 日，頁 4。
30. 上海申報館：《申報》，1943 年 11 月 14 日，第一張。
31. 上海申報館：《申報》，1946 年 5 月 20 日，第一張。
32. 子曰：〈張愛玲之貴族身世〉，《東方日報》，1945 年 4 月 12 日，頁 2。
33. 子岡：〈記白薇〉，《婦女生活》，第 3 卷第 4 期，1936 年，頁 31-36。
34. 友蘭：〈張愛玲失蹤〉，《海光》，第 14 期，1946 年 3 月 6 日，頁 2。
35. 天遊：〈海上新詠（七）：愛玲蘇青〉，《東方日報》，1945 年 6 月 23 日，頁 3。
36. 文海犁：〈《傳奇》印象〉，《力報》，1944 年 8 月 24 日，頁 3。
37. 木然：〈張愛玲諷刺蘇青〉，《香雪海畫報》，第 1 期，1946 年 6 月 26 日，頁 11。
38. 木樛兒：〈張愛玲從此孤枕獨眠〉，《風光》，第 2 期，1946 年 3 月 18 日，頁 9。
39. 半老書生：〈貴族血〉，《海報》，1944 年 9 月 20 日，頁 2。
40. 未老：〈胡蘭成難償相思願——蔣果儒勒馬、張愛玲失戀〉，《海花》，第 3 期，1946 年 4 月 12 日，頁 6。

41. 白色記者：〈看見張愛玲〉，《海濤》，第 20 期，1946 年 7 月 18 日，頁 5。
42. 吳江楓：〈「傳奇」集評茶會記〉，《雜誌》，第 13 卷第 6 期，1944 年 9 月，頁 155-160。
43. 李七：〈蘇青還看張愛玲〉，《力報》，1945 年 5 月 12 日，頁 3。
44. 李四：〈紅記者！紅作家！潘柳黛遭人檢舉〉，《銀都》，1946 年復第 1 期，頁 1。
45. 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和小報中的名人〉，《中國讀書報》，2004 年 1 月 16 日。
46. 狄斯：〈丁玲小傳〉，《女聲》，第 2 卷第 17 期，1934 年 9 月，頁 6-8。
47. 良廷：〈張愛玲「安定登」〉，《是非》，第 4 期，1946 年 4 月 18 日，頁 9。
48. 周太太：〈張愛玲開壽衣店〉，《黑白》，第 2 期，1936 年 3 月 24 日，頁 4。
49. 呵呵：〈胡蘭成生死未卜 張愛玲行踪之謎〉，《海晶》，第 4 期，1946 年 3 月 14 日，頁 5。
50. 定一：〈張愛玲結婚禮服設計〉，《海星》，第 12 期，1946 年 5 月 7 日，頁 9。
51. 阿拉：〈張愛玲鬧雙包案〉，《星光》，第 4 期，1946 年 4 月 9 日，頁 8。
52. 柳絮：〈張愛玲唱申曲〉，《風光》，第 14 期，1946 年 6 月 10 日，頁 11。
53. 洛川：〈崔承喜二次來滬記〉，《雜誌》，第 15 卷第 2 期，1945 年 5 月 10 日，頁 84-88。

54. 秋翁：〈最後的義務宣傳〉，《海報》，1944年9月12日，頁3。
55. 紅藻：〈也談蘇青〉，《東方日報》，1944年12月11日，頁2。
56. 胡蘭成：〈評張愛玲〉，《雜誌》，第13卷第2、第3期，1944年5月、6月，頁76-81、頁79-82。
57. 胡蘭成：〈談談蘇青〉，《小天地》，第1期，1944年9月，頁16-19。
58. 苗埈：〈記白薇：作家印象記〉，《時代婦女》，創刊號，1941年12月，頁10-13。
59. 風聞：〈張愛玲·欣賞名勝、解決小便〉，《香海畫報》第3期，1946年4月1日，頁2。
60. 真西哲：〈論胡蘭成與張愛玲〉，《海報》，1944年9月6日，頁2。
61. 馬川：〈張愛玲徵婚〉，《上海灘》，第1期，1946年4月1日，頁2。
62. 商朱：〈看女作家〉，《光化日報》，1945年7月10日，頁2。
63. 張愛玲：〈「卷首玉照」及其他〉，《天地》，第17期，1945年2月，頁15-17。
64. 張愛玲：〈女作家書簡〉第一則，《春秋》，第2卷第2期，1944年12月28日，頁74-79。
65. 張愛玲：〈必也正名乎〉，《雜誌》，第12卷4期，1944年1月，頁70-72。
66. 張愛玲：〈我看蘇青〉，《天地》，第19期，1945年4月，頁5-13。
67. 梅子：〈蘇青和張愛玲〉，《戲報》，1947年12月21日，頁3。
68. 章緒：〈附逆未遂之女作家——張愛玲琵琶別抱〉，《大觀

- 園周報》，第 10 期，1946 年 2 月 22 日，頁 7。
69. 無心：〈張愛玲衣譜〉，《海濤》，第 10 期，1946 年 4 月 27 日，頁 5。
70. 琳丁丁：〈張愛玲浪漫有法國風味〉，《海晶》，第 22 期，1946 年 7 月 28 日，頁 9。
71. 愛讀：〈張愛玲做吉普女郎〉，《海派》，1946 年 3 月 28 日，頁 5。
72. 路人：〈張愛玲買橘子〉，《海濤》，1946 年 3 月 17 日，頁 2。
73. 漢公：〈張愛玲相戀貴公子〉，《海晶》，第 9 期，1946 年 4 月 18 日，頁 8。
74. 蝦螻：〈跟在張愛玲後面〉，《香雪海》，第 1 期，1946 年 7 月 31 日，頁 5。
75. 赫金：〈張愛玲的綉花鞋〉，《國際新聞畫報》，第 50 期，1946 年 8 月 4 日，頁 10。
76. 鳳三：〈張愛玲刻意求工〉，《星光》，創刊號，1946 年 3 月 20 日，頁 7。
77. 廣成：〈張愛玲怪模怪樣穿怪裝〉，《香海畫報》，1946 年 3 月 18 日，頁 5。
78. 諸葛：〈張愛玲嗜吃臭豆腐〉，《上海灘》，第 20 期，1946 年 10 月 23 日，頁 12。
79. 醉雲：〈女作家〉，《力報》，1943 年 11 月 16 日，頁 3。
80. 鍾士：〈我看蘇青〉，《繁華報》，1945 年 5 月 30 日，頁 2。
81. 穩尚：〈從張愛玲說到禁止娶小老婆〉，《永生》，第 7 期，1945 年 12 月 10 日，頁 13。
82. 譚正壁：〈論蘇青及張愛玲〉，《風雨談》，第 16 期，1944

年 11 月，頁 63-67。

83. 鐵郎：〈張愛玲千里尋情人〉，《海濤》，第 9 期，1946 年 4 月 20 日，頁 9。
84. Benhabib, Seyla. “Models of Public Space: Hannah Arendt, the Liberal Tradition, and Jürgen Habermas,”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pp.73-9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4.

附錄



圖一、〈女作家情書特輯·煩交張愛玲女士〉，
《上海灘》，1946 年第 5 期（（1946 年 5 月 14 日），頁 6。



圖二、〈女作家情書特輯·煩交張愛玲女士〉，
《上海灘》，1946 年第 5 期（（1946 年 5 月 14 日），頁 7。